

奥本海默传

作者：[美]凯·伯德,[美]马丁·J.舍温

版权信息

书名:奥本海默传

作者:[美]凯·伯德 [美]马丁·J.舍温

译者:汪冰

出版时间:2023-08-01

ISBN:9787521758801

中信出版集团

前言

1953年圣诞节前4天，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生活突然陷入失控的旋涡，他的事业、他的名誉甚至他的自我价值感都岌岌可危。他坐在疾驰的车里，一边盯着窗外，一边感叹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汽车正奔向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那里是他律师的寓所。几个小时后，奥本海默将不得不做出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是辞去政府顾问的职务，还是反击那些对他的指控。就在当天下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毫无预兆地交给他一封指控信。信中声明，重新审查奥本海默的个人背景和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后，他被认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信中还列出了34项指控，其中有些不可理喻，比如“据报告，1940年‘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资助者名单上出现过你的名字”，有些涉及政治，比如“从1949年秋开始，你一直强烈反对研发氢弹”。

说来也奇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似乎自己将大祸临头。就在几年前，他读到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那还是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奥本海默是美国社会的偶像级人物，是同辈中最受尊敬和推崇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登上了《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封面。那时的奥本海默被这篇讲述执迷不悟与自负之苦的小说惊呆了，故事中的主人公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纠缠着，“他注定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悚的事情”。奥本海默知道无论将要发生什么，它都会将自己“吞没”。

二战后，美国反共浪潮日益汹涌，奥本海默越发感觉到一头“丛林猛兽”正在悄悄逼近。他被迫害共产主义人士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质询，他的寓所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媒体在散布对他过去政治活动和政策建议的诽谤之词，这一切都让他感觉自己正在被围猎。20世纪30年代，他在伯克利参加过左翼活动，战后他又反对空军的大规模战略核武器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些计划无异于种族灭绝，上述行为激怒了众多华盛顿内部人士，他们位高权重，其中包括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敦赫伯特和安妮·马克斯的家里，奥本海默反复琢磨着自己该如何抉择。赫伯特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密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马克斯曾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时的秘书。那天晚上，安妮发现奥本海默似乎处于一种“几近绝望的状态”。经过长时间讨论，奥本海默最终决定，无论背后有多少黑幕，面对这些指控，他都不会坐以待毙，这个决定部分是出于他坚定的信念，部分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尊敬的斯特劳斯”的信，奥本海默在信中指出斯特劳斯是在鼓动他辞职。“你向我提议了一个看似更可取的选择，那就是我主动提出中止与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合同，这样就可以避免面对那些指控……”奥本海默说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选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继续写道，“这种做法意味着我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结论，也就是我不适合为政府效力，可到如今我已经干了快12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我真的这么不称职，我不可能为国家效力那么久，我也不会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更不可能一次次地代表我们的科学界和我们的国家发言。”

当晚讨论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几杯酒下肚后，他到楼上客房休息。几分钟后，安妮、赫伯特和陪奥本海默来华盛顿的妻子姬蒂听到了“可怕的撞击声”。他们冲到楼上，发现卧室空无一人，浴室门紧闭。安妮说：“浴室门根本打不开，奥本海默在里面也没任何反应。”

那时奥本海默已经瘫倒在浴室的地板上，他失去知觉的身体挡住了门。他们尝试用力推门，把他瘫软的身体费力地推到一旁。据安妮回忆，奥本海默醒过来时，“他肯定在嘟囔着什么”。他说自己吃了一片姬蒂的安眠药。医生在电话中叮嘱他们：“可别让他睡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医生才赶到，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扶着奥本海默踱来踱去，还哄着他喝了几口咖啡。

那头“丛林猛兽”已经朝奥本海默扑了上来，这场劫难之后，他失去了为政府效力的资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磨难日后反而让他声誉更隆，也让他对后世的影响越发深远。

从纽约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从默默无闻到闻名世界，奥本海默一生参与了20世纪诸多重大的

斗争与胜利，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社会正义、二战和冷战。一路走来，他超群的智慧、他的父母、他在伦理文化学校的老师，以及他年轻时的经历都曾给他指引。他在物理专业领域的成长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德国学习量子物理学，他不仅热爱这门新兴科学，也成为它的传道者。20世纪3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美国最著名的量子物理学研究中心，那时美国国内经济大萧条的恶果及海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深深触动了，他和友人积极行动，一起投入争取经济和种族平等的斗争中，他的很多友人都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共产党员。那些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可是10多年后，为了让奥本海默噤声，他所做的这些被人轻而易举地用作罪证。这提醒我们，我们信奉的民主原则极易出现偏差，必须小心翼翼地捍卫。

奥本海默在1954年遭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麦卡锡时代并不罕见。但是作为一名被告，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二战时，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家们为自己的国家从自然手中夺取了令人惊叹的太阳之火。在这之后，他不仅睿智地申明了核弹的危害，也充满希望地提及了核能的潜在益处。再后来，几近绝望的他公开批评了军方提出的、战略研究者鼓吹的核战争计划：“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坚持不懈地质疑美国的核武计划，这让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极为不悦。1953年，共和党人重返白宫，刘易斯·斯特劳斯等支持大规模核报复的人登上了华府的权力宝座。斯特劳斯和他的盟友们决心让奥本海默闭嘴，他们担心此人会切实威胁到他们的政策。

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的反对者们对他的政治倾向和专业判断进行了抨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诋毁他的人品和价值观，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奥本海默个性的诸多方面：他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断坚决又惶恐不安，他坚忍淡泊又充满困惑。在这次听证会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委员会印制了一份密密麻麻的、逾千页的笔录，名为“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从中可以读到很多有关奥本海默个性的细节。但是，与此同时，这份听证会笔录也显示出奥本海默的对手未能真正刺探到他的内心，作为一个个性复杂的人，他早年间就打造了一副内心的铠甲。从20世纪初奥本海默在纽约上西区度过的童年时光到1967年他离开人世，本书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探究了这副铠甲背后谜一般的个性。这是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无论在资料研究还是撰写过程中，作者都秉持一个观点，那些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和决策（在奥本海默身上甚至可能还影响到了他的科学事业）。

在本书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它们来自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本书还参考了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超过25年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很少有公众人物受到过如此严密的监控。通过联邦调查局根据监听录音整理的文字，读者有机会“听到”奥本海默的谈话。然而，这些书面记录也只讲述了个人生活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采访的许多人已经过世，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让奥本海默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带领我们进入核时代，又步履维艰地寻找着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方法，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努力还在继续。

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身份和核文化息息相关。正如E.L.多克托罗所说的：“从1945年开始，我们就对核弹心心念念。起初它是我们的武器，后来成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而现在它影响着我们的经济。40年后，如此强大的力量怎会不变成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这个为对付敌人制造出的巨人成了我们的文化——核弹文化，它有自己的逻辑、信念和愿景。”奥本海默曾是释放核威胁的推手，但后来他致力于遏制核威胁，奋勇地将我们从核弹文化的歧途上引开。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一份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后被称为“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实际上它主要由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迄今为止，这仍是核能时代保持理性的杰出范式。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注定了该计划会失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包括美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兴核弹。随着冷战的结束，核毁灭的危险看似已经过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1世纪，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在后“9·11”事件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温“原子弹之父”在核时代伊始对我们的警告，原子弹是一种造成无差别袭击的恐怖武器，在它肆无忌惮的攻击面前，美国自身也可能命悬一线。1946年，在参议院的一次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奥本海默：“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消除核武器是抵御核恐怖主义的唯一出路。

无人理会奥本海默的警告，最终他被噤声。奥本海默给予了我们原子之火，他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腊神祇普罗米修斯——他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并把它赐予人类。但后来，当奥本海默想避免它失控，想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危险和恐怖时，那些当权者像宙斯一样愤然而起，对他痛下狠手。正如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委员会中支持奥本海默的沃德·埃文斯所写的那样，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1. E.L.多克托罗（1931—2015），美国著名犹太裔后现代派小说家、编剧。——译者注

序幕

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67年2月25日，尽管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了恶劣天气和严寒，仍有600名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友人和同人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他们聚在一起哀悼他，缅怀他的生平，他们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将军、科学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及来自各行各业的老相识。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温和的师长，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奥比”；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1945年他成为“原子弹之父”、民族英雄及科学家公仆的典范。然而，人们都痛心回忆道，仅仅9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就宣布他为危险分子，这让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美国反共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因此，在缅怀这位杰出人物时，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非凡的一生中有胜利也有悲剧。

前来吊唁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如伊西多·拉比、尤金·维格纳、朱利安·施温格、李政道和埃德温·麦克米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儿玛戈也参加了悼念，奥本海默是她父亲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的上司。罗伯特·瑟伯尔也来了，20世纪30年代，他是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好友，两人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共事。现场还有康奈尔大学杰出的物理学家汉斯·贝特，他因揭示太阳内部的热核反应而获得了诺贝尔奖。1954年，受到公开羞辱的奥本海默为了躲避尘世喧嚣，在加勒比海幽静的圣约翰岛建造了一座沙滩小屋，他们一家的邻居艾瓦·德纳姆·格林也参加了悼念，与她比邻而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显赫要员：长期担任总统顾问的律师约翰·J·麦克洛伊，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长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泽西州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林登·B·约翰逊总统派他的科学顾问唐纳德·F·霍尼格代表白宫出席了追悼会，霍尼格也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熟人，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时，他和奥本海默都在“三位一体”试验的现场。在科学家和华盛顿的权力精英中间，零星地坐着来自文学圈和文艺界的人士：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小说家约翰·奥哈拉、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艺术指导乔治·巴兰钦。

悼念仪式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大厅举行，奥本海默的遗孀凯瑟琳·普宁·奥本海默（大家都叫她姬蒂）在后排就座。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是一场气氛凝重、五味杂陈的追悼会。和姬蒂坐在一起的是他们22岁的女儿托妮和25岁的儿子彼得。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坐在彼得旁边，他也是一名物理学家，但他的事业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中被毁掉了。

大厅里响起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安魂圣歌》，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时就喜欢上了它，当时也是在这座大厅，就在去年秋天。随后三个人宣读了悼词，与奥本海默相识30余年的汉斯·贝特第一个发言。贝特说：“他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强盛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他是位领袖，但并不专横跋扈，他从不发号施令。他激发了我们最好的一面，就像一位好客之人的待客之道。”为了比德国先制造出核弹，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指挥数千人投入核弹竞赛，他把一片原始台地变成一间实验室，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建了一支高效的队伍。贝特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奥本海默，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建造的那个原始的“小装置”就不可能及时完工，投入战争。

第二个致悼词的是物理学家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他是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邻居。1954年，在原子能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只有史密斯投票赞成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史密斯目睹了奥本海默遭受的秘密审判——“安全听证会”，他完全了解其中的拙劣下作，他说：“这样的错误已无法被匡正，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污点也永远无法被抹去。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公的回报。”

最后发言的是乔治·凯南，他是资深外交官，也做过大使。凯南是二战后遏制苏联政策的提出者，也是奥本海默多年的好友，他们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事。从未有人像奥本海默那样激发了凯南对核时代种种危机的思考。当凯南对美国军事化的冷战政策提出异议，被华盛顿抛弃时，没有朋友像奥本海默

那样支持他的工作，并在研究院为他提供了容身之所。

凯南说：“人类刚刚征服了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它让人类的道德力量相形见绌，这一难题把我们推到残酷的现实跟前。对此奥本海默的担当无人能及，他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日益悬殊的力量对比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即便忧心忡忡，他追求真理的信念也从未动摇，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他追寻着各种形式的真理。面对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希望能为避免这样的灾祸出一份力。他心怀人类的福祉，但是作为一名美国人，他发现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抱负的方式是影响他所属的这个国家。”

凯南接着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黑暗岁月里，各种麻烦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身处旋涡中心的他不胜其扰。我提醒他，上百个国外的学术中心都会欢迎他的加入，我问他是否考虑到国外生活，他眼含泪水地回答：‘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个谜：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散发着杰出领袖的魅力；作为一位唯美主义者，他善于制造暧昧不明的朦胧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人生笼罩在争议、传言和神秘之中。对像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奥本海默是“现代核科学家悲剧的象征”。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是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中最具光环的殉道者，凸显了右翼分子毫无底线的恶行。对他的政敌来说，他是一名隐藏颇深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罪证确凿的骗子。

事实上，奥本海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才华横溢又充满矛盾，有时聪明绝顶，有时幼稚可笑。他是社会正义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政府顾问。他想努力遏制一场失控的核军备竞赛，结果反而在当权派中树敌无数。正如他的朋友拉比所说：“他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

在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眼中，罗伯特·奥本海默身上充满了深刻尖锐的矛盾。虽然他毕生致力于科学和理性思考，但是戴森发现奥本海默决定参与制造这种灭绝种族的武器是一种“浮士德式交易……当然，这个交易令我们后患无穷……”。后来，罗伯特·奥本海默还像浮士德一样，想与魔鬼讨价还价，结果自取灭亡。他带领人们释放出原子能的威力，但是，当他试图警告同胞其危险性，当他希望遏制美国对核武器的依赖时，政府开始质疑他的忠诚，并把他送上了审判席。他的朋友们认为这种公开羞辱堪比科学家伽利略的遭遇，1633年他被由中世纪思想控制的教堂审判。还有人在这件事中看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恶灵，它让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冤案。

不过，这两种类比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罗伯特·奥本海默其人，包括他作为科学家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作为核时代的建构者发挥的独特作用。本书讲述的就是他的人生故事。

1. 凯南被奥本海默坚决的态度深深打动。2003年，在凯南的百岁寿宴上，他又讲了这个故事，当时他眼含热泪。

□

《今日物理》封面照片中的帽子是奥本海默的平顶矮帽。

第一部分

□

奥本海默一家

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左）于1888年从德国来到纽约。1903年，他与出生于巴尔的摩的德裔美国画家埃拉·弗里德曼（中）结婚。出生于1904年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坐在父亲的膝头（右）。

□

奥本海默（右，旁边的是他的朋友）小时候热衷于玩积木和收集岩石标本。

□

母亲埃拉和奥本海默。

□

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弗兰克。

□

奥本海默（右）在纽约中央公园骑马。

□

奥本海默就读于伦理文化学校，在那里他被教导要发展个人的“伦理想象力”。

□

奥本海默曾就读于哥廷根大学，他在马克斯·玻恩（左上）的指导下获得了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与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左下）和德国物理学家H.A.克拉默斯（中）成为朋友。后来，他在苏黎世和伊西多·I.拉比、H.M.莫特-史密斯及沃尔夫冈·泡利（右，与奥本海默在苏黎世湖上航行）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

□

奥本海默与物理学家威廉·福勒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在一起，奥本海默（右二）站在他们中间。（左）1929年，奥本海默教授在加州理工学院。（中）罗伯特·瑟伯尔是奥本海默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右）

□

奥本海默会在自己占地154英亩的牧场佩罗卡连特度夏（左），那里可以眺望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奥本海默和他的马“危机”（中），他会与弟弟弗兰克和其他朋友一起长途骑行，其中还有伯克利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右）。

□

约瑟夫·温伯格、乔瓦尼·洛马尼茨、戴维·玻姆和马克斯·弗里德曼都是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追随者。“他们模仿他的手势、习惯和语调。”

□

在量子物理学的世界，温伯格认为：“尼尔斯·玻尔（上）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

奥本海默与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欧内斯特·劳伦斯。

第1章

“在他眼中，每个新想法都好极了”

我是一个装模作样、乖巧得令人生厌的小男孩。

——罗伯特·奥本海默

20世纪初，科学给美国带来了第二次革命。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很快就被内燃机、载人飞行和其他众多发明所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很快也因为这些技术创新发生了变化。但与此同时，一群高深莫测的科学家正在缔造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全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开始改变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现象；马克斯·普朗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等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原子性质的认识；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狭义相对论。突然之间，宇宙的面貌似乎也就此改变。

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家很快被奉为新的英雄，他们有望带来理性、繁荣和精英治理的复兴。在美国，改革运动正在挑战既有的秩序。西奥多·罗斯福利用白宫这一舆论高地鼓吹道，善治的政府如果与科学和技术联姻将缔造出一个开明的新进步时代。

1904年4月2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就出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他来自一个德国移民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有第一代移民也有第二代移民，他们在努力融入美国社会。无论从民族身份还是文化归属上，生活在纽约的奥本海默一家都算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又不去当地的犹太教堂。他们并不排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美国犹太教派，他们认同的这个犹太教派被称为伦理文化协会，它推崇理性主义和一种进步的世俗人文主义。与此同时，它也是解决美国移民信仰困境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这反而加剧了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持续终生的矛盾心理。

顾名思义，“伦理文化”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推崇社会正义而不是自我膨胀。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并非偶然，他在一种重视独立探究、实验探索和自由思考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这种文化体现的正是科学的价值观。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致力于社会正义、理性和科学的人生征程总让人联想起蘑菇云下的遍野横尸。

1871年5月1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东边的哈瑙。奥本海默后来说，他的爷爷本杰明·皮哈斯·奥本海默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平时也做谷物生意，他在“一座近乎停滞在中世纪的德国村庄”中的一间茅舍里长大。朱利叶斯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1870年，本杰明的两个表兄弟西格蒙德·罗斯费尔德和所罗门·罗斯费尔德通过结婚移民纽约，几年后他们与另一个亲戚J.H.施特恩一起开办了一家进口男士西服衬里的小公司。那时纽约的成衣市场方兴未艾，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9世纪80年代末，罗斯费尔德兄弟捎信儿给本杰明·奥本海默说他的儿子们在这里也有赚钱的机会。

1888年春，朱利叶斯到达纽约，比他哥哥埃米尔晚了几年。这个身材高挑纤细、局促不安的年轻人被安排在公司仓库里整理成卷的布料。尽管他加入公司时没有分文投资，也不会说英语，但他决心要出人头地。因为他对布料的色彩独具慧眼，他逐渐被公认为全纽约最懂“布料”的内行之一。埃米尔和朱利叶斯安然度过了1893年的经济衰退，到世纪之交，朱利叶斯成了罗斯费尔德-施特恩公司的正式合伙人。他的衣着也体现出了这种变化，他总是穿着一件白色高领衬衫和一套深色西装，佩戴一条花色保守的领带，而且他的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无懈可击。在大家眼中，朱利叶斯是一个非常讨人喜爱的年轻人。他的未婚妻曾在1903年写道：“你总能让别人对你充满信心，因为你优秀至极。”到30岁时，朱利叶斯的英语已经相当流利，虽然完全是自学的，但他还是广泛阅读了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会在周末的空闲时间徜徉于纽约众多的艺术画廊。

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被介绍给了年轻的画家埃拉·弗里德曼。她是一个精致美丽的少女，她有一头深褐色的秀发、精雕细琢的五官、一双顾盼生辉的灰蓝色眼睛和长长的黑色睫毛。埃拉身材苗条，

但是右手先天畸形。为了掩饰这种畸形，埃拉总是穿着长袖衣服，戴一副麂皮手套，她右手的手套里有一个简陋的假肢装置，有一根弹簧连接在一个人造拇指上。朱利叶斯爱上了埃拉。弗里德曼家族有巴伐利亚犹太人血统，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定居于巴尔的摩。埃拉出生于1869年。家族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描述她：“她是一位温柔、精致、苗条、高挑、长着蓝眼睛的姑娘，她相当敏感，极有礼貌。她总是想着如何让别人感到满意或愉快。”20多岁时，她在巴黎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早期印象派画家。回国后，她在巴纳德学院教艺术。遇到朱利叶斯时，埃拉已经是一名小有成就的画家，她有自己学生，还在纽约的一栋公寓顶楼开设了一间私人画室。

这一切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女性来说极不寻常，不仅如此，埃拉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她那庄重、优雅的举止给初见者一种傲慢冷漠的印象。对于一位从小物质生活优渥的女性，她在画室和家中表现出的勤勉和自律令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朱利叶斯崇拜她，她也回报了他的爱。就在他们结婚前几天，埃拉在给未婚夫的信中写道：“我真心希望你能尽情享受美好的生活，你愿意让我来照料你吗？照料自己心爱的人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甜蜜，这种甜蜜一生都不会消退。晚安，我最亲爱的人。”

1903年3月23日，朱利叶斯和埃拉结婚了，他们搬进了西94街250号一幢有山墙的石房子。一年后纽约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寒冷的春天，34岁的埃拉经历了艰难的孕期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朱利叶斯已经决定给他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叫罗伯特，但是在最后一刻，考虑到家族传承，他决定在“罗伯特”前面加上一个缩写字母“J”。事实上，这个男孩的出生证明上写着“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表明朱利叶斯决定用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这一做法本来并不稀奇，但是用在世亲人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违背了欧洲犹太人的传统。不管怎样，人们一直认为这个男孩名叫罗伯特，而且奇怪的是，后来罗伯特·奥本海默总是坚称他名字中的第一个缩写字母没有任何意义。显然，犹太人的传统在奥本海默家无足轻重。

罗伯特出生后不久，朱利叶斯一家搬到了位于河滨路155号11层的一套宽敞的公寓，那里可以俯瞰西88街的哈得孙河。公寓占据了整个楼层，屋里装饰着精致的欧式家具。在之后的许多年中，奥本海默夫妇收藏了大量法国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这些藏品都由埃拉亲自挑选。到罗伯特·奥本海默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的收藏包括了1901年毕加索在“蓝色时期”创作的《母与子》、伦勃朗的一幅蚀刻版画，以及爱德华·维亚尔、安德烈·德朗、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作品。在贴有镀金壁纸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幅梵高的画作：《日出时的田野》（1889年绘于圣雷米）、《第一步（临摹米勒）》（1889年绘于圣雷米）和《阿德琳·拉沃克斯肖像》（1890年绘于瓦兹河畔的奥维尔镇）。后来，奥本海默夫妇还购得了塞尚的一幅画作和莫里斯·德·弗拉曼克的一件作品。法国雕塑家查尔斯·德斯皮奥的一件头像作品为奥本海默夫妇的精美收藏锦上添花。

埃拉持家的标准很高，奥本海默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的口头禅——“优秀和坚毅”。三个住家女佣把公寓打扫得一尘不染。奥本海默有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保姆，名叫内莉·康诺利，后来又有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过他一点儿法语，但是家里人从来不说德语。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我母亲的德语说得不好，而且我父亲认为说德语没什么用。”后来，奥本海默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

周末，奥本海默一家会乘坐他们的帕卡德汽车去乡下兜风，驾驶汽车的是一名身穿灰色制服的司机。在奥本海默十一二岁时，朱利叶斯在长岛的贝肖尔买了一栋颇具规模的避暑别墅，奥本海默就是在那里学会的驾船。这栋房子下面就是码头，朱利叶斯在那里停泊了一艘40英尺长、设施齐备的豪华游艇，它被命名为“洛尔莱”。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海湾生活很美好……那里占地7英亩。……有一个大菜园，还有满眼的繁花。”奥本海默家的一位朋友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得到了父母的溺爱……他想要的一切都获得了满足，可以说从小就锦衣玉食。”尽管如此，他儿时的伙伴都不认为他被娇生惯养。“他在金钱和物质方面极其慷慨，”哈罗德·彻尼斯后来回忆道，“他绝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的身家肯定不止几十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美元，他相当于百万富翁。从各方面来看，奥本海默夫妇都是一对恩爱的伴侣，但奥本海默夫妇截然不同的性格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密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回忆说：“他（朱利叶斯）是一个乐天派的德裔犹太人，非常讨人喜欢。我很惊讶奥本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奥本海默传》（美）伯德,（美）舍温.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79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